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兄 弟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兄 弟

韩少功

兄 弟

韩少功*

进入小学以后不久，我看到过父亲一张身着解放军军装的旧照片，便在同学中间吹嘘老爸当过战斗英雄，当然还少不了一枪干掉两个狗汉奸之类的惊险故事。方强到我家里做课外作业，看了我爸爸一眼也深信不疑地说：“你爸爸看报纸的样子好威武，吃茶的样子也好威武，肯定当过师长！”

我含糊其辞地表示，也就是带一两万兵吧。

方强更激动了：“是坦克师长吧？是138师吧？”他喜欢信口编派出一些想象中的部队番号。“肯定是！肯定！”然后圆鼓着两腮发出嘟嘟的马达轰鸣，横架起双臂做坦克状不停地颤抖，把自己向往成一辆战无不胜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坦克。

这家伙到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帮着我把牛皮越吹越大了。

* 韩少功 男，1953年1月生于湖南省，曾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韩少功文集》（10卷）等。

后来，秦老师宣布免掉我班长职务，声称这与我的个人表现无关，而是在学生中开始贯彻阶级路线的必要举措。我不大清楚阶级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这是关系父母名声的大事。因此秦老师的宣布无异于当众给我一耳光，揭穿了我以前那些关于战斗英雄和坦克大战的无耻谎言，让我永远成为大家的笑料。我紧紧盯着地面，不敢看任何人，相信他们都在对我大惊失色交头接耳。而且从这一刻起，我不爱说话了，一放学就夹着书包飞快地跑回家去，情愿绕道也要包抄那些僻静的小巷，不愿面对任何熟人的目光。我觉得那条空无一人的麻石街小巷最为安全也最为亲切。

秦老师对我的笑脸突然消失，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丈夫是一个右派而且正在蹲牢房，阶级也不好，她不得不在脸上表现出更多的革命觉悟。方强和小虎也不到我家里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也是比较丢人的阶级，小土地出租、小业主一类，像电影里对地主老财点头哈腰满脸媚笑的那些人，或者是在革命战斗中缩头缩脑贪生怕死的那些人。他们的父母肯定也自惭形秽，肯定也同我的父母一样，瞪着眼睛只允许我们去工农子弟的家，只能交工农子弟为友。这都是一些让人半懂不懂的烦事。

在这一段比较清冷落寞的时节里，只有疤队长还常到我家来玩玩。疤队长叫罗汉军，右眼下一个疤痕使他有了这个小名。个头矮小，学习成绩不大好，画画倒是身手不凡，刚开学不久就把各科作业本都画完了，把课本上所有空白处也画满了，气得老师总是冲着他大拍桌子，拍得他低下头去咬紧牙关翻白眼。他画出美国的、俄国的、德国的、中国的各

种英武军官给我看，显示出他对各国的肩章、领章以及军阶具有丰富知识。他还特别喜欢画马，在我看来比墙上徐悲鸿的马还要画得好，因为这些马无论大小肥瘦，无论立着还是跑着，都夹着两条后腿间的一个粗大玩艺儿，让我们看得开心。但他画出这些大家伙时毫无邪意，一点也不笑，完全是严肃认真地追求着艺术的真实。

他常常穿一双大得出奇的套鞋，也经常打架，比较像个工人的儿子，因此把课本画得再乱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把题目错得再多也被秦老师视为革命后代，比我血统高贵一些。但他觉得我的古代武将画得不错，愿意同我交流艺术经验，也愿意与我一起喂喂兔子看看鸟。我们常常不怎么说话，各画各的，画完了互相看一看，直到他一声不吭地回家。我们骑在门槛上各自画画的情景，在蝉鸣声中有清风吹拂的情景，多少年后总是一次次浮上我心头。

他也邀我去他家玩过好几次。他家住在北京北三区三公里那一片棚户区，一条阴暗而潮湿的小巷子里，准确地址是戡子桥五号。他家门号牌有红色框边，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红五星，据说是他弟弟画的。他家没有收音机，没有画报，没有脚踏车，其实没有什么好玩儿。几间房子都矮小，墙上糊着旧报纸，地面有时潮湿得冒水，白天也常常需要开电灯才能有足够的光线，照片是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而且每次我走进这道门，他家里都有些混乱，不是桌椅左偏右倒，就是床上的帐子垮了或者枕头到了地上。每到这个时候，汉军就要冲着门外大喊一声：“汉民——”

这是他弟弟的名字。

“你皮痒了是不？讨打是不？”

正在门外挎着木枪站岗或者正在武装驱逐邻家小孩的汉民，立即跑来收拾乱局，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大眼睛在这个暗淡的房子里闪射亮光。

与弟弟较劲差不多是汉军每日的功课。有一次，我们刚推开房门，一道红光闪过，一只屁股上扎了红缨须的小刀已经飞来扎在门上，算是给我们的一个惊心动魄的见面礼。

“老子拍死你！”疤队长没有平时的沉静，对弟弟总是凶狠无比。

“报告上校，这是神刀，绝对不会扎到人的。”

“滚！”

“是！上校！”

“不准说上校！”

“是！002！”

“不准说002！”

“是！老货！老鳖！”

汉民扬起两根指头在额头一架，算是架出一个军礼，逃窜到另一间房子里去了。在那扇关紧的门后，有片刻的安静，但很快又传来他的高喊：“中！”“中！”每一喊声后都有神刀扎在木器上的声音。直到他的上校哥哥再一次怒喝：“小杂种，你要拆屋吧？”那里面的声音才最终平息下去。

二

罗家大哥叫汉国，很少在家里露面，在我看来是个神秘

人物。他的房门总是关着，有一次好容易开了一条缝，让我得以朝里面瞥一眼，发现那里竟是别有风光让人惊异。窗上挂了漂亮的纱帘，桌上有钩花台布，房间里还有棚户区少见的西式床以及床头柜，只是还没有油漆。床头柜上有一盏旧台灯，虽然用布条包扎着支架，但毕竟是一盏有模有样的台灯。墙角的手风琴也赫然在目，虽然如汉军所揭发的那样已经塌了几个键，但毕竟是一架有模有样的手风琴。屋里还贴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自励自戒性标语：知识就是力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8+6=24$??? 罗汉国，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诸如此类。

我后来知道，这间房子在他们家也是个非请莫入的禁区，平时总是锁着门。因为汉国的数学成绩曾经名列全班第一，因为他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市性的俄文朗诵比赛，因为罗家三兄弟中惟有他能拿回光彩耀眼的奖状，所以家里容许他独占一室并且使文明和进步自成一体。汉军对门锁似乎不以为然，对数学和俄文似乎也不以为然，见大哥回家也不怎么理睬。那位头发油亮的青年对弟弟的同学看来更没有什么兴趣，冷冷地看我一眼，就钻到他的高雅书斋里去了，砰的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有一次，听到里面有叽叽咕咕的读书声，确认他已经回到了家中，我敲开门请他解释一道算术题。他只把门打开一条缝，三言两语完事以后赶快关门，好像在严防我顺着这条缝得寸进尺。

他家父亲也是汉军嘴里一个若有若无的说法，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一张空床，还有桌上一个大得出奇的搪瓷茶杯——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据说他是一个老建筑工，不大管家里的事，经常参加义务加班，直到带着满口酒气深夜回家，一进门就倒床呼呼大睡。看到儿子们吵架或者打架，他一般来说是视而不见，要是被闹烦了，根本不论冲突双方的是非曲直，抄起一根扁担劈头盖脑把小崽子们统统打出门去，算是对整个事件的权威性总结。他需要这个家，只是需要劳累以后的安静睡觉。母亲对这一点大概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总是捧着一个水烟筒咕噜咕噜抽闷烟。汉军说，她在三个儿子中最宠汉民，一看汉民喊救命就会出面袒护，总是把闯祸的责任赖给两个哥哥，甚至不惜与丈夫动手对打。但她的宠爱也多是恶声恶气，比如摸出一角钱往汉民手里一塞：“哭死哭死，有什么好哭？老子一耳光扇得你贴在墙上当画看啊。还不快去买槟榔，吃你的冤枉！”

或者说：“老子还没死，你哭丧啊？你包子也吃了，油渣子也吃了，你那张鳖嘴巴还塞不住？”

汉民就在母亲这把保护伞下活得更加惊天动地。我亲眼看到过他发动对木器的科学研究，让家里的木器一一遭殃，都得被他好好地折磨一番，不是一条桌子腿被锯得高低不齐，永远也摆不平，就是窗户被刨去一块块油漆，永远合不上了。过几天他可能又突然生出养蚕的兴趣，于是家里的桌上和床上到处爬满了蚕虫，被子里也有蚕粪，饭锅和套鞋都会成为囤积桑叶的容具。汉军怒气冲冲，曾经把弟弟追打到巷口，回头气喘吁吁地对我发表预言：这个神经病，将来肯定要祸国殃民，不是判无期就是要吃枪毙！

母亲咧出一颗大金牙开骂：“你打死他吧，拿菜刀剁了他

的手，刮了他的皮，打死他你就安心了是吧？妈妈的，他喂几条虫碍了你的哪根肠子哪块肺啊？……”

我是遵照父亲的教导来工人阶级家庭学习的，可我除了钦佩汉国那些标语口号，找来找去没有找到更多的优秀事迹，倒是常常在骂声中感到不安和害怕。我在他家里总是没法把关云长或武松画得很好，以后就不大去他家了。

小学毕业后，我与汉军分别进入了不同的中学，后来又各自随着中学同学上山下乡。他很快就被一个县的国营石油公司招工，当然是享受了他家出身好的优势。他所在的县与我所在的县隔山为邻，于是他偶尔会翻过山来，给我送来一些他节余的粮票，与我继续说一些有关画画的事。说实话，他的画没有太多进步，还是那些立着或跑着的马，没有什么新鲜。他也不像我的有些知青朋友那样活跃，既不能用小提琴拉出整本整本五线谱上的舒曼，也不能一跃而起轻松攀住篮球架上的铁框，甚至不会讲鬼故事；寡言少语的习惯，更使他不大容易结交新的朋友，不大容易合群。他只是与我在大树下坐一坐，直到他一声不吭地离去。但我还是感谢他这种沉闷的来访，绝不接受同队知青对这种来访的疑惑不解和信口取笑。我还得感谢他把汉国那个塌了几个键的手风琴偷出来让我玩了几个月，直到在汉国的追查下扛回去。好几次回城探亲，我在街上走着走着就会忍不住拐进戛子桥去碰碰运气，看他是否也碰巧回了家。我当然很少在他家里找到他，只是看到他家在一步步发生着变化：先是砖墙已经经过粉刷，然后是大门刷上了绿色的油漆，最后门边还装了一个稀罕的电铃，想必这一切都是大哥汉国的手笔——他总是在勤奋地改

变着戛子桥五号的面貌并且与现代文明人家的风格接轨。他母亲有次含着水烟筒告诉我：还是汉国比较懂事，家里这些事就是他操心多，出力多。

有一次，我在街上一个公共汽车站无意中碰到汉民。这位已经长大了的弟弟，嘴上多了一圈浅浅的茸毛，两手插在裤兜里，有点精力过剩地把某只脚一踮一踮。他掏出一包烟，指头一弹，熟练地弹出一支，请！

“你学会了抽烟？”

“玩么。”

“你现在干什么？”

“你问我，我问天。我在干什么？先是在基建队当了两个月土夫子，一个月搞得担把水，”他是指赚得百来元钱，“还有味。去衡山玩了两天，看南天门，可惜没有钱去桂林和阳朔了。只怪我老娘生了三兄弟，国鳖又有什么关节炎，没有办法，我也要下农村。我在农村里吃不消，天天懒得出工，猪油吃完了就去偷，队干部怕了我们，只好请我们回城里来玩。”

他又说：“队上还有两个女知青，她们心还是好。你的衣邋遢了，对她们一丢就是，保证洗得干干净净。不过她们嘴巴厉害，好烈，我怕了她们。我娘还是好，吃饭尽我的量。最讨厌的是军鳖，成天一个卖煮蚕豆的样子。”他是指二哥的脸色难看。“好像我前世欠了他的，比爷老子还像爷老子，说话好大的口气，对我订了四大纪律，比毛主席还多订一条。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酒，三不准偷东西，四不准同妹子往来。要是我不听，他就动不动抡皮。”他是指用拳头揍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有一位瘦小的女子捂着嘴笑，让

我察觉到女子与他有什么关系。

公共汽车来了，我得赶上这一班车。他抓住最后的机会突然问我：“对了，你说一个人周游世界至少要带什么东西？”

你是说一个人？一个人周游世界？我对这个问题毫无准备，说这个么，我也说不准，大概，可能，至少，要带一个指南针和一把刀吧。

“不要放大镜？”

“放大镜取火？”

“对啊。”

“那就加个放大镜吧。”

“这三样就够了？”

“我也没试过。”

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被乘客挤得东偏西倒，挤到车门里去了。越过一位乘客的肩膀，我看见他在人行道上追赶汽车，圆睁双眼冲着我大张嘴巴继续他的提问。

我没法听见了，没法回答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不知道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什么荒唐主意。也许他正在向往着要去周游世界？或者正在一本什么历险游记的书里入迷？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离开了他一直在那里胡作非为的戛子桥五号，去了一个他根本不愿意呆在那里的地方，一个过于寒冷的地方。

三

汉民这家伙从乡下溜回城来，没人严加管教，什么坏事

都做过，包括在剧院里抢人家头上的军帽，包括把肉店里一个比他重百多斤的大汉打得哇哇哭。汉军怕他进一步学坏，本来希望汉国多管管他，但那一段时间里汉国带着一把二胡参加了北区街道工厂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在外面忙，不大在家里呆。这种情况下，汉军只好把弟弟托付给一位当中学教师的棋友，请这位棋友给他补习初中功课，顺便带他在校办工厂学点木工手艺，让弟弟好歹也做点正经事。

那位中学教师外号肖眼镜，下得一手好象棋，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家里还有两架子书，又无师自通成了电工和木工，很快就成了汉民的崇拜偶像，在汉民嘴里有了“大师”的专名。汉民有一次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副平光眼镜戴着上街，想必也是为了模仿大师的形象。他母亲好几次提着鸡蛋去面谢大师，说汉民自从跟上这位肖大师以后，不抽烟了，不闯祸了，连臭袜子臭鞋子都是自己动手洗了。他们罗家的祖上不知是积了什么阴德，让汉民这一次碰上了如此消灾解难的大贵人啊！

当然，弟弟的变化中也有了一些汉军不明白的东西，包括他脸上的一种严峻和沉默就让人捉摸不透。有一次他居然用锥子扎自己的胳膊，袖口上的血迹斑斑和胳膊上的纱布直到吃饭时才被汉军发现。他问弟弟这是怎么回事，弟弟说这是磨炼革命意志，试验试验而已。听了这一句疯话，汉军大为惊讶，没想到汉军没有桌腿可以修理了就拿自己的胳膊来搞试验和开发，天知道是中了什么邪。还好，他没有发现弟弟的枕头下藏有什么匕首，什么小妖精的照片，弟弟正在读的那些书，有《共产党宣言》，有《联共（布）党史》，有整

套的《列宁选集》，倒也是些货真价实的革命经典，让人找不出什么毛病。另外一些大本的外国书则内容不明，又存心不让人读懂似的，书上一个人名就可以长得占去大半行，放在嘴里死嚼硬咬了好一阵还是咽不下去。一本俄国车什么斯基写的《怎么办？》，汉军拿来看了几页就觉得头昏脑涨哈欠滚滚，根本不相信这种书有什么意思，更不相信眼前这个小杂种能够读懂这种天书。他怒气冲冲问起弟弟这本书是从哪里偷来的，为什么要看这种书。弟弟看了他一眼，不愿意答理。

在他的一再审问之下，弟弟才懒懒地说：“二爷，你做做好事吧，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是不是黄色小说？”

“黄在哪里？你指给我看看。”

汉军没有看过这本书。“这个车，车什么……”

“车尔尼雪夫斯基。”汉民替哥哥念出了作者姓名，念得太顺溜了。

汉军差点红了脸。“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个好家伙，肯定是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你读了这本书没有？你先读再发言好不好？你懂得什么叫做十月党人？什么叫做召回派？你连这些都不懂，有什么好谈？”

“小杂种，你像个人了是吧？你卵毛长齐了是吗？你脱了裤子自己看看！老子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晓得什么书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

弟弟转过背去继续读书。“道不同，不相与谋。”

“你做两道乘法题是正经！你小子走还没学会，就想跑，

就想飞啊，《共产党宣言》也轮得上你这号人来读？你再在娘肚子里翻两个跟头，看下一世有没有可能！”

“愚昧！”

“你说什么？”

“我说你愚昧，愚昧！”

哥哥的拳头已经挥过去了，打得汉民一闪身就溜出了门，在门外留下了一句愤怒呼号：“打倒斯托雷平！”多年后汉军才闹明白，那是指旧时俄国一个专制政府的头子。

汉军把车什么斯基一类书统统捆起来要扔出去，引来母亲不由分说的破口大骂：“读书比打架好吧？读书比偷东西好吧？……”汉军非但没有把书扔出去，倒是被老娘锄了一个丁公，头上冒出一个包。

后来就发生了那一件事。初夏的一天，大哥罗汉国想给家里修整一下橱柜，到处找他的刨子，最后撬开了汉民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他在弟弟的房间里还是没有发现刨子，但心惊肉跳地发现了油印机、纸张和油墨，还有一些署名为“马克思主义劳动社”的传单。他早些天就听说最近冒出了一个反动组织，全市好多公共场所出现过这个组织张贴的反动传单，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提出要为彭德怀和刘少奇翻案……引来全市警察倾巢出动，手忙脚乱到处搜索探访，闹得满城风雨。汉国没想到那些传单的源头竟在自己家里！竟在与自己房间仅有一墙之隔的那一间房子里！他在这间房前走来走去竟然完全不知道！他在这颗巨型定时炸弹前修脚踏车、刷油漆、洗衣服、吹头发而且吹口哨竟然完全不知道！他感到天塌了，吓得根本不敢再进弟

弟的房间，脚步踉跄地赶忙找回了父亲和母亲，又气急败坏地去找汉民那个不知死活的畜生畜生畜生啊——那一天汉民刚好去了另一个城市，事后才知道这个畜生在省城反动了一把还不算，正在把反动传单往周边各个城市里分送。

两天后，这个不知死活的汉民回家了，一进街口就被邻居认出并且抓住扭送给警察。此时几十个军警已经密不透风地守候在他家里和整个街区，高层建筑上甚至架起了机枪和无线电发报机，一个遮挡视角和射角的民房烟筒也被头戴钢盔的军人粗暴地砸倒。以前只在电影里见到的荷枪实弹大军压境吓得整个巷子里的老百姓都蛇行鼠窜，也吓坏了汉民的家人。正像邻居们当时知道的，罗家老汉一开始还冲着军警大声说：“你们何必这么辛苦？都回去吧，都回去吧，你看这太阳毒的！三崽子他肯定跑不了，只要一回来，我就会送他来投案！他舅子、他满姑、他大哥都找去了，我罗家都布下天罗地网啦……”他说了好多遍，发现军警仍然面色严肃坚守岗位，才觉出自己的话并未受到完全的信任，不免有些委屈。幸好汉民最终回来了，把破凉鞋挂在肩上光着一双脚走回来了，足以证明他的家人没有说假话，没有暗通消息放跑案犯。汉民在家里的落网也足以证明他父亲确实是一个老工人，是一个革命觉悟很高的老劳动模范，是值得领取以前那些奖状和搪瓷口杯一类奖品的。他父亲两天前想也没想就把汉民的事情告了官，而且保证送汉民来投案自首接受教育。

汉国不同意父亲告官，知道此事时发现父亲已经从派出所回来了，气得连连跺脚，大骂父亲是只猪。他当然被父亲操起一根扁担赶出家门，好几天没有回家。

汉国把汉军召回家，两人分头去摸案情。他们来到公安局，没料到接待他们的警察满面笑容，端茶送水。“我们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一位公安局副局长热情握住了他的手，“如果没有你们家属的大力支持和大力协助，如果没有你们这样高的政治觉悟，这个震动全国的‘6·13’大案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侦破！这么多案犯不可能在两天之内一个不剩地全部落网！我要代表党和人民政府谢谢你们！”

汉军支支吾吾地说，他弟弟早已同意投案自首，基本上也是投案自首的，请政府在审判量刑时考虑这一点……

“你父亲已经说过了，你母亲也已经说过了，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你就放心吧。”

“他还没有成年，完全是不懂事，是受人蒙骗和利用……”

“当然，他太年轻么，不是首犯，也算不上什么主犯，党和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明确政策界限的。何况他还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怎么可能真正走上反革命的路呢？是不是？”

“我老娘身体很不好，已经卧床一个星期……”

“看了医生没有？吃了药没有……她老人家一定要保重，一定要保重。我们过几天就去看她。我说过了，我们还要给你们送一面大锦旗。我们和你们的心是相通的，目标是一致的么。你们的亲人，也就是我们的亲人。我怎样对待我的小孩儿，也会怎样对待你家的小孩儿！你母亲就放心吧。”

汉军眼睛一热，突然跪了下去，脑袋在地上砸出三声巨响。他看见窗边还有一个正在打字的小警察，也冲过去磕了三个头，感谢警方的情深义重。

副局长连忙把他扶了起来。“不要这样，你弟弟是你弟弟，你是你。你们虽然是罪犯的家属，但你们没有罪，非但没有罪，你父母亲和你全家还有功么！是不是？你喝茶，你不要激动。”

对方再次把汉军的双手紧紧握住。

四

汉军后来多次回味这一次求见时副局长有力的握手，回味他家里的那面鲜艳锦旗——是一群警察和几位街道居委会干部敲锣打鼓送来的，上面有“无私父母高尚情操”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汉军问我这些举动里面有什么样的暗示，问那面锦旗是否有利于他弟弟从轻发落。当时“6·13”大案还没有判决，马劳社被老百姓戏称为“马上劳改社”，真真假假的有关传闻已经从城里传到了乡下。汉军利用星期天来看我，买不到汽车票，没能够搭上每天只有一班的长途汽车，便步行三十多公里山路，走到半夜才摸进了我所在的村子。他说只能在这里停一停，因为他还得走回去，明天早上还要上班。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是反革命案犯的亲属了，不得不格外注意遵守劳动纪律。我没法留住他，也没能在柜子里找到点辣椒和面条给他做点吃的，便在衣袋里揣上两个生红薯，陪他上路夜行。我们走在夜色里隐约可见的沙石路面上，脚下嚓嚓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亮，不时惊跑了路边的青蛙，或者招来附近村子里的一片狗吠。黑森森的山峦在我们身边有时慢慢地升起来，有时又慢慢地落下去，像一片黑色的巨浪汹

涌澎湃一次次要把我们吞没在浪谷。

走着冒汗，我们索性脱了上衣，光着膀子赶路。途中遇上一阵大雨，算是给我们劈头盖脸洗刷了一通。

“都是那个小杂种害的，”汉军在屋檐下把湿透的上衣拧出一串水滴，“等他出来，老子要他好看。”

“他这次挨了一烙铁，应该会有教训了。你以后还是只能同他好好地讲，打打骂骂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他差点害得我们家破人亡啊。这个畜生！你想想，要是判他个七年八年，我老娘的一条命不就送到他手上？全家人的反革命家属不就当定了？国鳖也是个王八蛋，当初装关节炎，不想下乡，我也就不跟他争了。传单就在他隔壁印，他天天只会梳头发，照镜子，不闻不问。我老娘也是个猪，当初就不该让他跑回城里来……”

“汉民可能会没事吧？那个副局长既然已经那样说了……”

“难说，传单毕竟都是在我家里印的。”

我们没有再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再说下去不过还是些重复了多次的分析和预测。每个预测说起来都很有道理，说着说着又破绽百出不堪一击。我看得出太多的分析已经让他有点扛不住了，看得出他害怕黑夜，也害怕即将升起的太阳，于是决定再陪他走一段。

嚓嚓嚓的脚步声在我们身后激起回声，听上去似乎有人在后面跟踪，使人忍不住经常要回头看看——虽然那里什么也没有。

其实，我很想宽宽他的心，比方说一说我哥哥的故事：他

原来属于省城最为激进的红卫兵派别，对现实十分不满，上山下乡时去了西南一个遥远的山区小县，在那里与同队知青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继续他们激进的大事业。他们白天做农活儿，晚上在油灯下读书和讨论，规划着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革命。有一次，一个领队的知青朋友来借粮食，顺便从一位粗心大意的女知青手里借走了他们的讨论记录本，并且一借就再也没有归还。后来才知道，记录本作为反革命罪证上交到了公社，并且一直惊动了县、地、省的政治高层。据说毛泽东视察南方某省城时，省委书记在汇报中还提到这个问题，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之一，是一些极左派的红卫兵到了乡下还在准备重新建党、重新建军、重新建国，企图对抗和颠覆“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红色政权。毛泽东对这一汇报的详细指示不得而知。后来据一位身处官场的朋友私下透露，传达下来的领袖指示纪要上只有一句话：“有些事二十年以后再看吧。”这句话细想起来其实很费解，引而不发若即若离也很像毛泽东的诗歌风格。二十年以后再看，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等二十年以后再收网打击？还是领袖相信革命形势会越来越好于是二十年以后反革命小子们就会不攻自溃或不战自降？抑或毛泽东在那一口吐出的烟雾里还有什么别的玄机和深意？……反正就是因为有这句见诸纪要的话，就是因为这一个神秘莫测的二十年，山里的那个知青学习小组居然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被抓捕，没有任何人被批斗，他们试探着到公社里去要求回城探亲，公社干部的脸上甚至没有任何异样的表情。他们拿着公社开出的回城度假证明踏上真真切切的火车，又走下真真切切的火车，来到真真切切的都市广

场，竟不敢相信眼前的自由是真的！

我很想告诉汉军，我家遇到了奇迹，他弟弟肯定更会有好运，光是他的红色血统就足以抵掉几年刑期。这还用怀疑么？但我最终没有这样说。自从哥哥他们那个记录本的一去不返，我也学会了守口如瓶。何况我知道汉军正在怨恨那个棋友肖眼镜，那个把他弟弟引入重案的中学教师。一旦他知道我家也有一个肖眼镜，他会不会再吓出一身冷汗并且不再与我交往？

我把红薯递给他。

“你吃。”

“你吃。”

我们总算又找到了话题，总算张开了嘴并且发出了声波，谈了一些关于红薯和乡村的事情。

我们在一座老桥分手。我看着他脚步一歪一歪地走进了曙光，没有再回头。我后来给他去过一封信，他没有回信。队长买回石灰的时候，用报纸垫着多孔的箬箕。我扯了一角报纸去了茅房，在这一角皱巴巴的旧报纸上读到了几则迟到的旧闻：样板戏演出、夏粮丰收、三结合小组科技攻关，还有一个罗汉民：……国庆节前同时被判处死刑的还有所谓马劳社反革命组织主犯罗汉民，昨日已被押赴刑场伏法。消息的大意就是如此。我惊恐得差一点摔倒在茅房里，一口气把这句话来回看了十几遍，不能相信它是真的，疑心是不是有别的罗汉民。当这种愿望和假设一步步消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体内已成了一个大空洞，空洞中心的强大吸力正在抽干我的血肉和我的思绪，正在每一个毛孔里发出尖啸。怎么可能

呢？怎么可能啊？人们不是说着可能会判有期徒刑、监外执行乃至教育释放吗？我感到不是那个少年而是我在这个茅房里被一枪击毙了。拉动枪栓的声音传来。钢铁的枪口对准我的后脑勺，钢铁的子弹带着飕飕的冷风飞驰，清脆地击破了头盖骨，然后旋起碎骨和脑浆四处飞溅，在前面那一个草坡上播开一片雨状的腥物，把我推入突如其来的无边黑暗。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听不到任何东西，也摸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像一缕透明的空气在漂游和流散。

我在这一天知道了死的滋味。队长和其他农民最终发现我栽倒在茅坑前，没有注意到我后脑勺上无形的弹孔，没注意到这一角旧报纸正越过门槛随风飘去。

我将永远记得我的家——北区戛子桥五号，北区戛子桥五号，北区戛子桥五号，北区戛子桥五号，北区戛子桥五号……

是在签名后留下了这些笔迹？在判决书的空白处一直写到无处可写才中断？多年以后公安局把有关材料给家属过目时，才让我的家人明白一个普通的地址原来也是一句可以重复千万遍的誓词。

在另一个纸片上，是那位少年还是我写出了以下这些话：妈妈，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妈妈，宣判的时候，我本想朝您站的那个方向跪拜，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但当时肖眼镜找我讲话，使我忘记了这一行动，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妈妈，你们没有来看我，不要我了，但我还是你的儿子。

母亲居然没有看到这些话。她在听到宣判时已经昏过去了，在儿子死后的第三天也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儿子遗物

送回家里来的那一天。为了表示坚决拥护正义的判决并且与反革命罪犯彻底划清界限，我的父亲和大哥也坚决不让母亲去刑场给儿子送行——既然已经声明脱离了关系，就不能有这些拖泥带水不清不白的勾当。我们全家和亲戚那一天没有一个人去刑场，倒是在劳模父亲的带领下，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天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在高声诵读的时候，我挂着“反革命组织主犯”牌子，在五花大绑之下度着最后时光，正在从看守所通往刑场的路上东张西望，一直在围观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对亲人抱有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我只是希望把他们再看一眼，一眼也就足够。其实我并不准备说什么话，我知道这不可能。我也不奢望拥抱和亲吻，我知道这些更不可能。我只是想看一眼，让我的目光触摸一下母亲和亲人的面容，让目光在这一片人海里还有最后的接纳和停靠，让自己不至于离开得过于孤单。

我眼中的世界模糊了，可耻的眼泪流了下来，于是我用高喊口号的办法来镇定自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万岁！”“打倒……”不过第二句口号没有喊出来，早已套在我脖子上的那条毛巾已经突然勒紧，肯定是身后的军人勒的，勒得我两眼发黑，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些经验丰富的军人肯定用这种办法成功地对付过任何喉管，不让它们恶毒猖狂地搅乱革命气氛。

与我同时被处决的同案犯还有两人，其中包括我们的领袖肖眼镜。他太让我失望了，一被捕就悔过认罪，供出了他的所有同伙和追随者，但仍然没有保住那条小命。这个可怜的家伙完全不像他以前夸耀的那样勇敢和坚定，没有唱《国

际歌》更没有微笑，完全不像个男人，在去刑场的路上一直没有站稳过，两条腿成了两根棉花条，是左右两个高大军人架起来拖着走的。我忍不住想帮他一把，但一身绑得无法动弹爱莫能助。我看见他的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了火星乱跳。我当然也看见了妻子和父母，看见他们在人群中哭得泪流满面地追赶着囚车。我突然有说不出的委屈：老天，这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为什么那是他的家人而不是我的家人？为什么我形单影只倒是这个吓晕了的可怜虫反而有家人追赶着一路相送？

五

我不想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好些年里不再愿意提到罗汉民这个名字，以免再一次使自己全身发冷和心痛欲吐。我努力让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空白，就像从来也未发生和从来也不存在的东西，永远退出自己平静的小日子。我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很快被宣布结束了，很多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居然都平反了，连我家父亲也获得了平反昭雪。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小汽车停在我家门口，几个陌生人走过来，笑着向我母亲打招呼并进了房门。他们发现这里没有足够的椅子让他们安坐，也没有足够的开水给他们泡茶，便说不用客气了，躺在床上说说就行。这么多陌生人真是把我的母亲吓坏了，使她一直躲在墙角，屁股一挪再挪拼命地挤着床头架，完全是手足无措而且答非所问。客人说你丈夫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军人和革命干部，我母亲就说儿子昨天刚回家探亲。客人说你

丈夫的所谓历史问题已经被完全否定，我母亲就说儿女现在工作得都非常好。客人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母亲就说楼板上哗哗响的是老鼠，怎么打也打不尽，实在太讨厌，你们要注意盖好你们的茶杯……她似乎一直没有明白客人们是来干什么的，更不习惯握手这种礼节，待客人走了还摸着自己刚刚脱险的右手大为生气：“搞什么鬼呢！吃了饭也不干正事，男男女女这里一窜那里一游，吊儿郎当，无事生非，还差点踩死了我的鸡，耽误了我买豆腐……”

我向她解释了好一阵，才让她明白了这些客人来访的意义，而且直到半年后我们搬回了宽敞明亮的机关宿舍，她才摸着久违的窗台和阳台，相信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是的，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始。亲人和朋友的好消息也陆续传来。小学同学方强甚至为他家的房产百思不解，说他家的铺面明明有一半早卖成了现钱，还有一半也算是他父亲捐给了政府，怎么现在统统都发还给他们家？是房子就可以发还么？发还了就是他们的了？是不是房管局的档案乱了套大家就重新洗牌随便摸？

我和方强也说起了马劳社的案子，兴冲冲地去找汉军。他已经成了家，调回省城在一个工厂食堂里做饭。妻子又高又大，穿着大红色的丝绸袄子正在看押着小儿子画马，见儿子稍一走神就用钩衣针在小脑袋上敲打一下。汉军把母子支到另一间房里去了，让我们把手伸进烘架上的热被子里，给我们一人递上一支烟。

“你弟弟的事现在有什么动静？”

他没有吭声。

“你家里的人也不去跑一跑？”

还是没有吭声。

方强有点不明白了：“上面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要不要我们帮着找找什么人？我有个堂兄最近调到省检察院做事。”

汉军清了一下嗓子，翻了一下白眼，弹了一下烟灰，所有能做的准备动作都做足了，才缓缓地说：“他算不上走资派，算不上右派，平什么反？”

他又冷笑一声：“公安局就是你们办的？法律是你们写的？光是政治案还好说，汉民在银行打劫也算是英雄？”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后来才明白他以前对我们隐瞒了一段。当时马劳社缺少经费，汉民曾经胆大包天带着少年在储蓄所门前打劫储户，往对方脸上突然撒一把沙土，然后强行夺包，再一声口哨四下逃散，不过作案未遂而已。

我体会到案情的复杂，但还是很快找到了新理由：“现在天下大赦，不会拘泥于细节。抢钱固然不对，但当时的动机是为了抵制‘文革’，应该说是好心办好事但没有找到好方式是不是？何况并没有造成后果是不是？”

“你这是狡辩。”

“狡辩也先狡辩一把再说么。”

“我说了这个案子不同一般。”

“能翻一半也好。”

“屎不臭要挑起臭？”

“是要把你们头上的屎盆子摘下来啊。”

“我戴着什么盆子，关你们什么事？”

他突然生气了。我与方强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他今天吃错了什么药，简直混账无比。直到他吐出一口长气，把我们拉到大街上散步，我们才最终明白了他的混账。“你们真是死卵，你们说的那些道理我没想过？我是汉民的亲哥哥我没想过？这几年来我差不多天天在想，夜夜在想！”他声音有些异样了，“但我问你们一句：平一千次反一万次反，我弟弟还能再活一次？”

这问题不用回答。

“好，既然不能死而复生，一个空名对他有什么用？他平反了，但我老爹还活不活？”

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层，几乎忘记了当初汉民是由他父亲举报到公安局去的。汉军说得对，如果儿子是个罪犯，他父亲可以说是大义灭亲，还可能心安理得聊度晚年；如果说儿子是个英雄，他父亲就成了双手沾满亲子鲜血的凶手，至少也是凶手的同谋，将被押上新的审判台。在这种情况下，平反对于我们家有什么意义呢？冤死者还是死了，只是冤屈被千万倍放大，压在生者的头上，成为生者的罪恶。那只不过是在夺去了弟弟的一条性命以后，再来夺去他父亲的一条性命罢了。那只不过是用声势浩大甚至家喻户晓的平反仪式，用鲜花、哀乐、眼泪、赞词、握手以及死者的遗像，把老父亲的一颗心千刀万剐一遍又一遍而已。

我和方强都不说话。

汉军擦了擦眼睛：“是不是罗汉国要你们来当说客的？”

他疑惑地看了我们一眼，似乎不大相信我们否定的回答。

“那个臭杂种没安什么好心，讨个婆娘也是个婊子！他们不就是想吃死人饭么？不就是想买电视机和房子么？他不是个人，他休想进我这道门！他喊三麻子来也不行，喊莫少爷来也不行……”

这些话我和方强就听不大明白了。

六

汉国拍拍我的肩，递来一张名片，才让我认出眼前这个烫出了波浪形鬃发的美男子，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一个音像公司的编辑，并且当上了什么协会的理事。我们碰巧在同一桌吃饭，就餐者都是市政协的委员，还有他身边一位身着皮短裙的红唇少女，据说是某局长的千金。汉国说了个什么传闻，我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说话中“佛罗伦萨”一词既响亮又有意大利语的神韵，但差点被我误听成“湖南长沙”。他笑出了一串串金属共鸣之声，同时不忘记每一盘菜端上来之际，都抢先给身边的皮短裙夹菜，夹得她满碗色彩灿烂都要堆不下了，也不管其他人操着筷子四下寻觅无菜可取。她无精打采地挑了几筷子，说这明珠大厦的菜就是不好吃，拿出化妆包要离席，汉国也就赶忙放下碗筷跟在她屁股后头离去。

下午是小组讨论，汉国身边还是坐着这位身份不明的皮短裙，让几位高龄的委员不安地交换着目光。汉国开始发言了，是补充前面几位委员关于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意见。他说到慷慨激昂处领带都滑到背上去了，茶几上的杯子也被他拍得跳了起来。“全国各地都在大力纠正冤假错案，为什么我

们这里就是阻力重重？那么多罪恶累累的人为什么还不忏悔？”他目光炯炯环视四周，开始说到当年的马劳社和他的弟弟，说他弟弟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烈士，是南方的张志新和遇罗克，是勇敢保卫刘少奇、彭德怀及一切革命老干部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并且为此献出了年仅十六岁的生命！十六岁哇同志们！还是青春少年哇同志们！他说这个案子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虽然已经名义上获得平反，但纯粹是“高空作业”和“文字杂技”，有关政策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他的母亲，当年就是因为悲痛而死的，可至今没有一分钱的抚恤费。烈士的父亲和两个哥哥，多少年来就因为这个冤案而丧失了政治前途，不能上大学，不能提拔重用，可有关方面至今没有任何补偿。还有他家的住房和父亲的病……他哽咽得有些说不下去。

他拿出了两张照片，分别是两位老干部与他的合影。一位是刘少奇的夫人，一位是退休老将军，据说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他们都为他弟弟当年的义举而深深感动，并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

他又拿出一首诗的手稿，说全国某著名诗人听说他弟弟的事迹以后曾经彻夜难寝，连夜写下了这首长诗以表示对他全家的慰问。

你比我们都要嫩弱

但你用肩头担当了所有的责任

你比我们都要年轻

但你的眼睛里收藏了所有的历史

你在刑场上回过头来原谅我们所有人的缺席

一声枪响，多少人今后长夜难尽

.....

在很多委员好奇的请求之下，汉国开始朗诵这首长诗。我得佩服他圆润明亮的嗓音，佩服他浩荡奔腾的激情，并且渐渐被他感动。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一路急板冲向了最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正在颤抖。他的头突然偏过去，接着低下去，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脑子里冒出来他刚刚提到的“佛罗伦萨”，眼下正有一种面对佛罗伦萨的某座古典雕塑的感觉。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他还是个活人，发现他正在设法掩藏着自己的失声痛哭。我忍不住心头一紧，鼻子也跟着发酸。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安慰他。他刚才发言时的某种夸张，还有刚才饭桌边的某些小动作，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倒是我的暗中挑剔想起来令人惭愧，算不得什么义道。我看见皮短裙少女也在眼泪汪汪，看见更多的听众也红了眼圈。有人走上前去，把无法再朗诵下去的汉国扶回座位，给他倒了一杯水，让他控制一下情绪。但听众的情绪有点无法控制了。一位出版界的委员愤怒谴责政府有关部门的落实政策方面的迟缓。一位剧团的委员擦着泪眼，提议大家为马劳社冤案的彻底平反签署联合提案。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干部走上前去，握住汉国的手，说罗同志你一定要节哀，一定要节哀，你的兄弟就是我们大家的兄弟，你的苦水就是我们大家的苦水，你哭吧，大声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些。我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一定要把你提出的问题过问到底，一定要让九泉之下的烈

士真正得到安息。

我看见他的背脊在老干部的怀里一起一伏。

碰巧的是，这天晚上我到大学一位朋友那里去玩儿，一个大学生组织召开什么会，请几位社会名人去演讲，把罗汉国也请去了。据说到会的学生太多，组织者只好把会场从小教室改成大教室，又从大教室改成灯光球场，一个晚上折腾了好几次。于是，汉国那一头漂亮的波浪鬃发在几只临时聚光灯的照射之下，又不期而遇地撞入了我的视野。面对着黑压压的青年学生，他再一次朗诵全国著名诗人写来的长诗，再一次抑扬顿挫地赢得了灯光球场上一片鸦雀无声。然而我大为惊讶地发现，在朗诵到“我是地下的煤我要燃烧——”一句时，节奏还是一路急板冲向高潮然后戛然而止，他的嗓音照例沙哑，伸向空中的一只手照例颤抖。他的头照例偏过去，接着照例低下去，照例甩下一头黑发的波浪，照例长时间不再发出声音。我只能从他下垂头发的剧烈抖动中，发现这座古典雕塑再一次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然而这一痛哭来得太精确了，太规范了，太雷同了，完全是一连串设计动作的如期实现，使我的鼻子怎么也酸不起来。我在听众的人海里只是久久地惊愕。

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很多人涌上台去找英雄的亲人握手和签名。

也许，正是这一个扫兴的夜晚，使我后来对汉国所做的一切都难以信任。连他的一个惊讶，一个微笑，一句“佛罗伦萨”，我都怀疑出自台后的排练。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玩会了这一套。报上后来公布了罗汉民烈士当年的读书笔记摘要，

还有罗汉民烈士当年家书的轰动性发表，都是汉国整理供稿的。我不能不怀疑这里面都有他的排练，更不相信他那些出生入死以求保存这些珍贵资料的离奇故事。我很想感动起来但总是力不从心。有一次他还打来电话，问我的哥哥愿不愿意写一写他们当年的知青学习小组，最好要写得有趣味一点，写得主题鲜明情景交融栩栩如生一点。他使用了这些文学学术语以后又冒出一句音调飘滑的“罗曼·罗兰”，作为他心目中写作的最高标准。他说有一个台湾的出版社要出版一套丛书，其中有一本专门介绍“文革”时期的中国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这实在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好机会。他从来认为朋友高于一切，所以知道这件事以后首先想到了我和我们家。

我想都没想就说这不可能。他不知道我的火气为何这样大，问你跟太太拌嘴了？我说没有。他哎哟一声，说那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觉得他没有谈到报酬？他说写这些文章确实……确实是没有报酬，只是尽社会责任而已。他那里虽然会拿一点编辑费，但他要寻找选题、搜集资料、联络协调，加上审稿，加上国内外数以百计和千计的电话，得让他倒贴好多钱呢，但有什么办法呢？社会责任感啊！

我说这不是什么钱的问题，只是觉得家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没有什么好说的，更没有办法做到栩栩如生。

他继续说服我，电话中不时插进一些礼貌的抱歉：“对不起，我要换一个磁带了，请你等我二十五秒钟。”或者是：“对不起，我要给太太递一下袜子，请你等我七秒钟。”或者是：“实在对不起，我要关一下空调了，室温实在太凉了，请你再等我十三秒钟。”诸如此类。每一个小动作的时间预估都

精确到秒，而且确实说到做到。

直到他最终放弃了说服，也还是不失佛罗伦萨式的风度：“周末愉快，bye！”

他后来果真去了欧洲，很可能圆了佛罗伦萨之梦。他的照片上了一本朋友寄来的 London Review，是一张沧桑老墙之前的沉思之照，眼里透出无穷的苦难和非凡的忍受，只是新近拉出的一道双眼皮让我陌生，让我看了好一阵才确认是他。这张明星照片的旁边有一篇文章：《地火在中国》。是一名记者对这位中国地下运动杰出人物的采访。

他的自我吹嘘不会使我惊讶，只是他内外有别的说话技巧让我刮目相看。这就是说，他知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在什么分寸上要悄悄带住，在什么情况下又可以大大越位，不经意之中把每句话往对方心窝里说，都指向获取利益的最大可能。比方他现在已经到欧洲了，是面对着西方的记者，弟弟的故事便在他的嘴里有了微妙的改写：弟弟是一个叫“劳动社”的地下组织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语已经隐去）；这个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国的专制，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保护老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等一类国内版标签已经及时摘除）；这个组织多年来有成员和非正式成员多达 millions 受到迫害（估计中国人大多不懂英文而且读不到这个杂志，不妨把数字随便加几个零脱口而出，往大里说）；这个组织是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个遭到镇压的政治异己人士团体（完全是欺侮一般西方人闹不清中国这几十年来风风雨雨）……最后，他竟然自称是劳动社这一组织当年逃亡脱险的领导人之一，曾经在中国南部大山的原始丛林里过了

好些年逃亡生活，这次来欧洲募集国际社会的捐款，为国内众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下面是他说的一些辛酸故事，是那些可以让西方三流记者摩拳擦掌然后可以让西方家庭妇女大擦眼泪大动悲情的故事。其中包括他说到的《圣经》——他说手中这本《圣经》是弟弟在牺牲前留下的唯一读物，因此他现在不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它，不论睡哪里都要枕着它，以表示对弟弟的怀念。这真是让我好笑，我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汉民不会读《圣经》，那本小书肯定是他从哪个旧货摊上花几角钱人民币买来的——他花几角钱就可以赚来欧洲家庭妇女的哗哗眼泪。

记者看来接触过中国的一些资料，居然问到肖寿青（肖眼镜）的妻子和孩子，甚至问到汉民当年在银行前面打劫的事。

“完全是圈套！后来有铁的事实证明，银行在中国公安部门的指令下制造了这一事件，嫁祸于我的弟弟！”

记者很满意：“我们估计的也正是这样。”

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听到，不免有些吃惊。我很想找汉国查证他这样说的根据，不过很不容易找到他。电话打到他的音像公司去，对方说他已经调到总公司去了。电话再打到总公司去，第一次，女秘书说他已经去参加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第二次，女秘书说他陪北京来的某位老干部看望战友；第三次，女秘书反复查问我的姓名和事由，见我不说出事由，便说罗总今天不在办公室，她只能替我转告。

他的明亮美声总算在电话里冒了出来，问我有何贵干，待我说完便哈哈大笑：“老弟啊老弟，西方媒体的话你能相信吗？”

谁能拿出我谈话的录音？跟你这样说吧，我最近还要我的律师起诉《纽约时报》呢，还有台湾的《新新闻报》，他们也造了我的谣，造成了多少不好的影响啊。只是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才没有顾得上这件事。”

他说他还要接一个国务院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把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活得如鱼得水。他现在一定正在冲着镜子做鬼脸，一定正在大吻特吻自己的化妆照，对自己的一贯聪明洋洋得意。

七

春节长假通常是老同学见面的机会。同学们都老了，话也差不多要说完了，眼下见面的时候更多的是搓麻将，或者是玩一种叫做“三打哈”的纸牌游戏。一见面就支桌子，人多的时候就支上好几张桌子，直到大家算着各自手里的钱尽兴而去。我不会麻将也不会纸牌，在这种情况下不免有些悻悻然。方强帮过我的很多忙，见面还满嘴下流话骂我不去他家玩儿，但每次去他家，他都黏在牌桌边没法起身，只是遥遥招呼一声，指着桌上的香烟或者茶叶，要我自己招待自己，没工夫与我说上什么。有一次我没有预约就闯上门去，看他没有牌务的时候能不能同我说话。他不在家，在电话里对老婆说马上就回来。但我等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直到我出门的时候他才出现在门口。走什么走？你看我特地买来了一瓶好酒！他把我往门里赶，知道我实在要去车站接客人，才无可奈何地把酒瓶交给他老婆。“那我们一起走吧，

我那里正是报仇雪恨的关键时刻！”

他没进家门就跨上脚踏车重返麻将战场去了，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没有办法。有很多人是我的好朋友但也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们无法回忆当年某一条僻静无人的石街小巷，无法回忆当年的夏日、蝉鸣以及坐在门槛上画画的宁静。轻柔的风抚摸着我们童年的自由和闲暇。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一切但总是没法回忆，因为这样的回忆不合时宜，无法在饭桌或牌桌边展开。对于已经成年的我们来说，那些往事是已经成为化石的种子，是一张张挂着锈锁而无法打开的废门，是电脑里不慎遗失的文件徒剩下空空的目录。我们都明白，过去了一切无法找回。

汉军不打麻将，所以还能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陪陪我。但他现在话语也不多，总是笼着袖子，配上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还有过早上头的皮帽子，真是老工人了。他一时兴起的时候，居然会大谈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相，谈这个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有三个基本定律，一是对立统一定律，一是量变与质变定律，一是否定之否定定律。知道不？三个定律之后还有十二个范畴，知道不？现在报纸上那些记者作家对这些完全不懂，只会做一些自己不懂别人更不懂的猫叫狗叫，完全是搞诈骗。他激动得口舌结巴，见我并没有响应和拥护，便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继续说得深一脚浅一脚的跌跌撞撞，在迷阵里好容易探出头，还没好好喘上一口气，一失足又落入新的迷阵，苦苦摸索而长途无尽。我很惊讶他还深藏着这一身功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熟悉了并且记牢了这样复杂的

概念和逻辑。这真是一个新发现。可惜的是，他的听众太少，除了我以外，通常只是某位同学的一个胖公子，把电子游戏机玩累了，把糖果也吃腻了，才来看罗大伯翻着白眼怒斥当今的诈骗犯。

“我们老师不是你这样讲的。”胖公子发现他还在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

“你们老师晓得个卵！他读过侯晋华的书么？”他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大概是他印象深刻的一位作者，让我无言相对。我自信读书不少但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胖公子更是被这个大名镇得不敢吱声。

“他晓得斯托雷平是哪一个？”

胖公子更加不敢吱声。

“我们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字根本不会写得像鬼爪子踹的一样。”

罗大伯还没提到当年的画画。

他打掉了胖公子的蒙昧，正要回到理论解释的长途，不料屋里有一桌牌和了，爆发出笑骂声。两个小把戏一逃一追争夺什么玩具，把胖公子也吸引了过去。他只好再次笼起袖子，一声不吭地把目光移向电视，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再没有说话。

我有些奇怪的是，他的声音越来越干，也越来越尖细，好几次被我误以为身后是女人在说话，不知是什么原因。

这种女人的声音从不谈他的父亲。我知道，他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汉民已经从罪犯成为烈士的消息，汉军不让他看到公安局送来的平反通知，不让任何客人在父亲

面前谈起有关的事情，甚至严格防止家里出现有关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方强还把老人送到方家乡下老屋去住了一段，让老人远离城市也远离各种可怕的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汉军半夜里醒来，发现父亲的房里有灯光，发现父亲坐在床头凝视着手中一张弟弟的照片，便明白这位退休老人已经知道了一切。正在这一刻，停电了。老人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怒，跑出门去大叫大骂，骂电业局也骂儿子，骂累了就去推邻居家的门，发现推不开，拾起一块砖头就砸门，吓得邻居以为来了江洋大盗。汉军和其他人忙去拉扯他，但此时的他已经不认得儿子和邻居了。他愤怒地大喊：“这是我的家，你们这些畜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睡觉？你们拿这些手电筒来骇得住谁？……”

他被送进了医院，一躺就是十来天没有苏醒，一直靠输液维持生命。医生说 he 恐怕是不行了，家属得准备后事了。汉军和家人不相信这些混账话，去找院长哀求和争辩，又把父亲转到了另一个医院。事情的结果是：父亲最终醒了过来，而且慢慢恢复了正常。他能够重新与邻居打牌了，能够重新上街买菜了，能够重新在巷子里扫地并且笑呵呵地与方强一起去钓鱼了。他的一场大病只留下了两个不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戒了酒，转而喜欢喝罐装可口可乐，儿子和媳妇给他的钱全部花在巷子口那个杂货店里，转眼间就变成一个个空罐出现在墙角。口袋里没有钱的时候，他甚至厚着脸皮找晚辈或者邻居讨要。二是喜欢宣传毛主席著作和党报的最新社论，包括赞颂中国女排和开展党风教育的要文。他找来纸和笔，把这些特别要文的段落摘抄成小字报，拿到外面四处张贴，贴

在电杆上或者墙头，贴在那些性病广告或者职业介绍广告旁边。

市容监管队见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广告就撕，撕得老人十分伤心。一旦发现他前一天张贴出去的文章不翼而飞，他就呼吸粗重，满脸涨红，手指开始发抖，胡言乱语也就随口而出：“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毛主席交给了我一个重要任务！”……

为了不让他再次病重入院，汉军偷偷去求市容监管队，求他们对那些小字报手下留情。他愿意为父亲承担罚款，或者出钱买下街头的广告位置。

有钱好办事，老人的小字报后来果然有了特殊地位，可以保留三天左右或更长时间。这使老人比较高兴，背着手在巷子里走来走去，见到熟人远远就高声招呼，还偷偷地告诉汉军，好多人都来看他的手抄报，你看看，真理就是真理，谬论就是谬论，真理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哩。

他不知道这些真理的代价不菲，一个月就要花去儿子几百块钱罚款。厂里停产的这一年，汉军拿不到工资，实在交不出罚款了，就偷偷变卖了家里一个进口的电饭锅，气得老婆脸色铁青。“他不疯，我就要疯了！”老婆当即把淘了一半的米摔在水池里，水淋漓的指头指向丈夫的鼻尖，“姓罗的，你再卖啊，你电风扇卖了，电饭锅卖了，你把电视机也拿去卖啊！把你儿子老婆也拿去卖啊！你不卖就是小婆子养的！”

“你讨打？”汉军压低声音怕老人听见。

“你打啊！你打！你要什么臭威风？你有威风到你老子面前耍耍看！你有威风到罗汉国面前去耍耍看！他罗汉国就不

是你们罗家的人？他是来端过一天药还是喂过一天饭？他是来送过一次米还是来送过一次油？他拿走了所有的慰问费、赞助费、抚恤费，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好欺侮啊？”

汉军也冒出无名火，拍桌子大吼：“滚！”

女人一怔，捂着嘴跑到卧房里去了，在那里放出一线沉闷的嚎哭。

汉军抽了一支烟，缓和了一些，走到床边冲着女人一起一伏的背脊和高高突起的胯骨，不知道该说什么。“离吧，我早说过罗家不是你呆的地方。”他又说，“你吊颈也要选棵大点的树，莫说我们拖累了你。”

“你动不动就说离，你怕我不敢离？”

“是要你离，反正你们洪家从来也看不起我，你们洪家都有钱，你们洪家都是人物，你早就应该听他们一言。”

“我是后悔自己执迷不悟，我是鬼迷了心窍才来做牛做马，我当初去做婊子也不会这样人不人鬼不鬼！”

“我现在就写协议。”

“你以为这吓得住谁？吓白菜啊！”

“我是说真话。”

“你敢写，我就敢签！”

“一言为定。”

“老娘不签就不是人！”

妻子果然在离婚协议上飞快地签了字。第二天，汉军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停着一台眼熟的红色日本轿车，看来是妻弟的动作很快，是要来接他姐姐走了。他停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此时应不应该进门，不知道面对洪家的人该说些什么。他想要在墙上找到苍蝇或者蜗牛一类值得关心的东西，想碰到邻居然后有停下来说话的正当理由。他听见屋里传出了妻子的声音：“……我是要恨他，我是要恨他，你们讲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你们要我怎么走得这扇门？结婚十八年了，他明明是个好人我没法说他是坏人啊，我没有办法啊。老天，我没有办法啊。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一片静寂，然后是她弟弟的一句怒吼：“你是个猪！你是个疯子！——”两个女声的叽叽喳喳随即跟上，似乎是在继续规劝着什么。

“我是一个疯子，早就疯了。我不可能走……”这是汉军听到的最后一句。

他走出了小巷，走到了大街上，茫然地往前面走。他走到方强的家，还走到一个熟人的家，但主人都不在。不知什么时候，他发现夜色已经完全降临，发现城市已经远远甩在身后，发现自己来到了母亲和弟弟的坟头。他坐在空无一人的墓园里，想抽一支烟，还没有打燃火，突然捧着自己的头嚎啕大哭起来。

八

我又来到了戛子桥五号。我远远就嗅到了车前草的气息，这些草长在墙根、井边、后院，有时也偷偷长在床下潮湿的角落。我还远远嗅到了麻石、青砖、朽木以及绿苔，嗅到了门前石阶的冰凉。我听到了大门吱呀一声如此耳熟，似乎门是被我在多少年前推开。我看着进门后左边第一间房子，第

二间房子，还有右边和前面的房子，记得当年每一间房子的陈设和模样，记得这些房子当年在油灯下轻轻地摇晃。我看见木窗上有几处刀痕，还有更多的钉痕，还有厨房门后油漆涂下的“八十”两个字模糊不清，想不起这些痕迹后面的故事，想不起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面容和神情。妈妈。

我见到了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老头儿，还有他的老伴儿，不知是这座房子第几任房主。他让家里的每一间房都堆满了玻璃酒瓶，说靠回收和洗刷这些瓶子能够维持生活。他们也在准备过春节，桌上堆着干肉、干鱼、红枣、年糕、烟酒以及瓜子花生，还有将要贴到门口去的红对联。远远的地方已经有爆竹爆炸的声音。

他问我：“你是谁？”

我没有回答。

“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我还是没有回答。

他说这里的房子都快要拆迁了，罗家的人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不知道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说也有几个陌生人来看过这房子，打听罗家的人，但近几年来已经渐少。有几次他开门的时候还发现门前有一束花，但不知是谁留下的。

我知道是谁留下的。

我轻轻地来，又轻轻地去，没有脚步声。我果然又一次听到身后吱呀的关门声于是暗自得意。我总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敲错门的人，或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一个上门推销挂历袜子一类商品的人，总是与你们擦肩而过。